

基于黄河灾害研究综述的思考

李明奎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同时它又被称为灾难河,自战国时期开始,黄河泛滥成灾的记录不绝于书。然而,黄河本身无利害之分,用人类的智慧对其进行治理和利用才是关键。从大禹到东汉王景和元代贾鲁以及新中国时期,都曾有过成功治河的实例。因此,对于黄河历史地位及其作用的界定,不能仅凭几次河患灾害或者几个对后世有利的水利工程来论断,而应做通盘认识,具体分析。

关键词:黄河;母亲河;灾难河;黄河治理;治河政策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5)05-0052-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5.05.010

On a Review of the Disasters from the Yellow River

LI Ming-kui

(Institute of Southwe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which breeds brilliant Chinese culture, is the mother river and also the disaster for all Chinese. Since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the records of the disasters are frequently found. However, the key is the control and usage for it with the help of human wisdom. From Dayu, Wangjing in the dynasty of Eastern Han and Jialu in Yuan dynasty, these famous peopl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for the control and succeeds were also found in new China.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cannot be relied simply on the disasters and waterworks which are advantageous for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the Yellow River; the Mother River; the river of disaster; control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policies of river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1]160}黄河,在中国历史具有极高的地位。但是累年不绝的河患造成了巨大灾害,因此历代均注重黄河的治理。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济南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全面指导黄河流域的治理工作。由于黄河对于民生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众多的学者、机构从多个方面对黄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研究其河道的历史变迁及其影响^[2-5],研究黄河河患形成的原因与特点^[6-10],研究历代统治者的治河政策及其措施^[11-13],或者从社会史和环境史的角度探讨河患与移民、河患与生态环境等问题^[14-16]。在这些众多的研究中,关于黄河地位与作用的探讨,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黄河是一条灾难河,它给国家和人们带来了沉

重的负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黄河是一条母亲河,是延续中华民族的血液。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时期,如何看待黄河的功过,如何对其灾害做出恰如其分的鉴定,是每个黄河研究者所必须正确认识的问题,也是做出合理治河决策的基础。本文首先粗略回顾以上两种关于黄河的意见,再提出评论黄河历史地位与角色的三点认识,以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黄河的两种观点的回顾

一些学者认为,黄河为害的成分居多,是一条灾难河。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黄河的决口、改道,给下游地区造成深重的灾难。例如,邹逸麟教授在《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一文中将黄河造

收稿日期:2015-10-13

作者简介:李明奎(1990—),男,云南昭通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

成的灾难概括为:洪水和泥沙淹没了农田和城镇,留下了大片碱地和沙荒;黄淮海平原上河流的淤浅和水运交通的衰落;平原洼地的湖陆变迁。^[17]¹¹⁻²⁰可见,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地理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史问题。第二,黄河的泛滥对下游海岸线的变迁产生较大影响。这里主要是指黄河泛滥,使得海岸线不断向海推进,最终导致海岸发生本质的变化。以江苏省为例,在南宋至清中叶(1128—1855年)的这段时期内,由于黄河大规模南泛,长期夺淮入海,使海岸线不断向海推进;而且河水的冲刷使北部海岸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曲折侵蚀性的岩岸、沙岸转化为平直的淤泥质堆积海岸,海岸带的地貌形态和动态产生新的特征。清中期以后,江苏沿海地区的海岸变化以大喇叭口划分为南北两种类型,大喇叭口以北的海岸以侵蚀为主,海进陆退,大喇叭口以南的海岸继续呈现不断淤长的态势。^[18]第三,黄河的泛滥还使其他内陆运河被淹,并致使其运河功能衰落。如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隋唐时期永济渠的南段——在隋唐时期的军事运输和漕运河北之粟入渭方面,曾扮演着重要角色。北宋时,御河在军事上的防御和加强中原地区与北方边疆的联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自从神宗元丰年间,黄河于小吴决口后,黄河水北流汇入御河,导致御河或数为涨水所冒,或亦湮没,其内陆河所具有的漕运之利逐渐消失,御河最终成为一条淤河。^[19]

然而,也有学者对黄河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是一条母亲河。他们的理由如下:第一,黄河是中华文明的诞生地。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及其孕育,全在黄河流域,而且自春秋战国下迄汉唐盛世,中国史上最光荣最灿烂的时期,便在黄河流域发皇滋张。那时的长江还占不到重要的位置……总之……就乾隆以前的中国史看,上半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后半部以长江流域为主脑,大体上却是黄河流域代表的文化还超在长江流域所代表的文化之上”^[20]²³⁹。岑仲勉先生则将其具体为:“两汉、隋唐、北宋和明清七大朝代,黄河皆担任着艰巨的任务,其间较为沉寂的,只有北朝及金、元两时期各约二百年。光荣的历史都那样悠久”,而长江“除了近世百年以外,只有从东晋南渡起到隋文帝平陈止及南宋一朝,才算对南朝充任了两个时期的艰巨任务”。因此,岑仲勉先生认为:“近世人的看法,江河比重,当然江胜于河。可是比量他们旧日的历史,则无论

政治上、经济上,江所负的使命都远赶不止河那么重要,活跃的时间也不像河那么长久。”^[2]⁷¹⁵第二,黄河一线的水利工程促进了我国北方农业的发展。如郑国渠“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鹵鹵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白渠“广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21]正是这一系列的水利工程,促进了我国黄河流域一线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其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第三,黄河泛滥所堆积的泥沙和形成的沿海平原是潜在的土地资源,有利于缓和今天人多地少的矛盾。黄河入海所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平原地区堆积,长年下来,形成了河口三角洲和一系列的沿海平原,而这些将成为我国宝贵的国土资源。

二、关于黄河利害观的三点认识

持黄河是灾难河的观点的学者,主要是基于黄河大量的泥沙和河患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稽考史册,此确有明文记载而不可回避;认为黄河是母亲河的学者,则以黄河繁衍哺育了黄河流域的先民,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华夏农业文明自解,此亦是实情,见诸讴歌而不可抹杀。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黄河之历史地位?笔者愚见,要全面、正确评价黄河的地位,需要做一通盘的考虑,不能凭几次河患灾害或者几个对后世有利的水利工程来论断。否则,同是一条河,为何在这一朝是人人歌颂的利河,到另外一朝便成为众人厌弃的害河?为何在前代安流,在后代便泛滥成灾?

首先,笔者赞同黄河产生中华文化的深层原因在于与黄河交叉的各条水系所形成的极权地带,而不仅仅是黄河本身。“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极权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极权地带。周文化则发生在现在陕西省之东部,黄河大曲之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极权地带。这一个黄河的大限曲,两岸流着泾、渭、伊、洛、汾等几条支流,每一条支流之两岸及其流进黄河

的三角枢权地带里面,都适宜古代农业之发展。而这一些支流之上游,又莫不具有高山叠岭为其天然屏蔽,故每一支流实自成为一小区域……合宜于人类文化之生长。而黄河的几个渡口……则为他们当时相互交通的孔道。”^[22]正是黄河及其周围诸水系的相互作用,才创造了适宜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环境。否则,单单一一条黄河,如何担负得起这一历史的作用?

其次,在春秋以前,黄河在繁衍我们先民、哺育我们文化方面是起着积极作用的;其泛滥为害是进入战国秦汉以后的事,而且其大规模的泛滥起于唐天宝以后。其实,商朝的迁都,并非远离黄河,恰恰是靠近黄河。有学者研究认为:“仲丁迁隩,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虽然《史记》说‘河数为败’,而殷都却始终近河。尤其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七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而殷墟在当时,亦是沿着古黄河的一地。及至殷纣,商邑日大,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邱,皆为离宫别馆,聚众百万,左饮淇水竭,右饮洹水不流。”^①可见,其盛况非比一般。岑仲勉先生也考证认为:“商族当日活动的中心,北起邢台,南至安阳,东南达于内黄、濮阳,不出数百里之地。所谓迁,恐怕只是描写游牧民族的习惯而辞不达意,未见得定与黄河溃决有关。”^{[2]121}至西周,由于其都域地处黄河之上游,其发皇滋张,得河之助,可不具论。单就西周所封之诸侯来看,从《诗经》的歌咏中也可以想见当时发展的景况和黄河诸水的得力。如《邶风·新台》云:“新台有泚,河水弥弥……新台有洒,河水浼浼。”《鄘风·柏舟》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鄘风·桑中》云:“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卫风·硕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鲔发发。”《卫风·竹竿》又云:“籊籊之竿,以钓于淇……淇水湫湫,桼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再如,《魏风·汾沮洳》中的“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汾一方,言采其桑”,《魏风·伐檀》中的“河水清且涟猗”,《小雅·瞻彼洛矣》中的“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从这些歌咏中,可以看出黄河流域在当时,

是多么的繁荣,处处有水,处处见水之可爱。这时的黄河,或为绿竹聚集之地,或为种桑采桑之所,或为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乐园,或为踏青游玩的风景之地,或为鱼奔虾跳的欢乐场面,或为垂纶长川的闲情乐处,并没有泛滥的景象和流民失所的哭声。

战国时代,各国相继变法,兴修水利,以水为战,以邻为壑,导致黄河多次为害。战国时期,各国竞筑堤防,“壅防百川,各以自利”,而且实行水战。据《资治通鉴》卷一载:“智伯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不与。帅韩魏之甲,攻赵氏于晋阳。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智伯乃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23]12}自此以后,开决诸水为战之端,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齐宣王十一年,与魏伐赵。赵决河水灌齐魏,兵罢。”《秦始皇本纪》云:“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赧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城。大梁城坏。”

至汉代,黄河泛滥的后果更加严重。汉武帝时河决瓠子,洪水泛滥,所及达十六个郡,历时二十余年,“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至东汉王景治河后,八百余年,不闻河患。^②唐天宝后,河朔之地,久为藩臣割据,纵有河事,不闻于朝廷,导致河事日衰。进入五代,其政治不上轨道,藩镇称雄。其中,各藩镇多为武人掌控(其藩帅、郡牧、刺史等皆用武人),武人恃勋骄恣,酷刑暴敛,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所惑,卖官鬻爵,割剥蒸民。而各藩镇间,互相攻伐,以劫财为务。各藩镇虽杂用文人掌书记(如李克用之用李袭吉,朱温之用敬翔,魏博之用李山甫等)、为副使、判官,然藩镇皆武夫,其恃权任气,多蔑视文人,或至非理戕害,最酷者莫如张彦泽杀害其幕僚张式,将其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更甚者,藩镇之兵,骄横跋扈,视变更主帅如儿戏,如唐明宗、唐废帝、周太祖等皆由军士拥立,朝廷无法,亦只能姑息之。^[24]藩镇既然不受朝廷之节制,多为患于政治,为害于生民,故兵乱不绝,而兵乱又屡次决河水以战。梁贞明四年(918年),谢彦章攻杨刘,决河水以限晋兵。至唐同光二年(924年),因梁贞明四年所决河,大为雷、濮等州患,唐主乃命

①钱穆在《古史地理论丛》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下自注:“此据《竹书纪年》,上‘七’字误,殆为二百七十三年。”

②黄河在东汉王景治理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安流时期。其期限有说七百余,有说八百余年,也有说九百余年的。说法不一,此据谭其骧等人的主张,取八百余年。

人塞之,既而复坏,危害不小。可见,进入五代后,政治动荡,兵祸连绵,社会的治安、百姓的安定受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很少有人顾及黄河的治理,甚至不惜人为地决河为战,破坏黄河的流向。北宋和南宋初,常年战乱更是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国家亦无暇顾及黄河的治理。因此五代后,宋元明清各朝都有黄河大规模泛滥为害的记录。

最后,黄河为害,咎不在黄河本身,而在于利用黄河的后世人,其智慧和能力不足以运用黄河,而导致其为害,即人为因素占极大作用。黄河最早的治理,应为共工和伯鯨,其法主要是高筑堤防。至大禹治理黄河时,开始采用疏导与分流的方法,终于解决河患问题,定九州,序贡物。战国至秦汉,由于各国竞筑水利,以水为战,以邻为壑,导致黄河河患日益严重。西汉王莽时期,黄河于魏郡决口,王莽以保护祖坟为借口,竟不治,听任其自流,使得黄河大改道,蹂躏河济之地,为害六十余年。至东汉王景治理黄河后,方安流八百余年。^①亦可见人事之重要也。据《资治通鉴》记载: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仪令乐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兴役。乃止。其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衮、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他役,不先民急。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诏发卒数十万,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23]1453}

《后汉书·王景传》载:

(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高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卫要。疏决雍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

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25]

岑仲勉先生将王景治理黄河成功的原因概述为:1. 根据自然的分流而加以整理;2. 针对沙泥的淤积而量作分移。^{[2]276-280}盖当时河患,亦非昔日的堵塞、筑堤坝能治理,必须分流。西汉的贾让提出著名的治河三策作为治理黄河的根本原则,其要亦在此。而王景的成功,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即据时势而加以损益。后世治理黄河的人,主要也是遵循这两条道路:分流和束河固堤。治河者智识水平不同,其采取的方法也因人而异,其成效就也不同。此处以元明两朝为例来做一简述。元代治河,以贾鲁为代表。其经过,见于《元史》一八七《贾鲁传》所记载:

至正四年,鲁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九年,太傅、右丞相脱脱复相,论及河决……鲁复以前二策进,丞相取其策。……十一年四月,命鲁……领河南、北诸路军民,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一十五万,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咸禀节度,便宜兴缮。是月鸠工,七月凿河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诸扫诸堤成。水土工毕,河复故道。^[26]

邹逸麟教授将贾鲁治河的成功概括为“亲自踏勘了黄河下游河道,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且总结了前人治河经验,设计了下游河道的综合治理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施工”。另外,贾鲁的“疏塞并举”,准确地说,应是“疏、浚、塞三者并举”。因此,邹逸麟认为岑仲勉先生对贾鲁此策的批评(岑仲勉先生在《黄河变迁史》一书中认为此策略之失在于湮塞北河,只疏通南河,导致不能尽泄黄河之水)是隔靴搔痒,未能把握问题的实质。^{[17]56}这是元代治河的主要情况。

至明代,河患依然严重。明人治河,率多主义与

①黄河经东汉王景治理后,何以出现一长期安流的局面。学者进行了多方的探索,有说是王景治河的技术好,有说是当时的社会稳定、政府重视等,而谭其骧教授认为:东汉王景治河后,黄河出现了一长期的相对安流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此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以畜牧为主,因此较好地保持了这一地区的水土。而此后黄河的泛滥为害,亦主要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畜牧转向农耕。(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此文又收入谭氏《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一观点,对于学者们长期纠缠的问题,给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解答。其实,治理黄河的根本,在于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和下游的蓄水排沙工作同时进行,从全河治理着眼,单靠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并不能解决河患问题。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亦属于人的意识范畴,即人的因素(或说是人事)占主要作用。

议论,很少亲自实践。以《明史·潘季驯传》为例,万历初年,河决崔镇,黄水北流,高堰湖堤大坏,淮、扬、高邮、宝应间皆为巨浸。大学士张居正深以为忧。时吴桂芳议复老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欲塞决口,束水归漕,两人议不合。其后,吴桂芳卒,潘季驯以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初至河上,历虞城、夏邑、商丘,相度地势后,上疏请复故河,因给事中王道成以“方筑崔镇高堰,役难并举”及河南抚按亦陈三难的缘故,不得实行。而在治河这件事情上,最体现明人善议论之风的,则数万历二十年的泗州大水事件。当时,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朝廷官员或欲开傅宁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浚周家桥入高、宝诸湖,或欲开寿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张福堤以泄淮口,议者不一。对此,潘季驯主张祖陵乃王气所中,不宜轻泄,而巡抚陈于陞、巡按高举等认为周家桥在祖陵后百里,可疏浚,双方争持不合,潘季驯最终辞官。^[27]而且明人治河,又诸多畏忌。他们既怕罹伤田庐,又恐毁坏城郭;既恐妨碍运道;又恐惊扰陵寝;既恐拖延日月,又欲节省金钱;这还不算严重,严重的是异地之官和异职之使,他们以职权和地理为由,竞护其界,各争其利。因而明人治河成败的关键,在于不能发现和抓着治黄的重点作为决定方针的基据,所以,其治河策略及举措都有举棋不定之感。即以潘季驯治河而言,他曾四次奉命治河,前后长达二十七年,习知地形险易,增筑设防,置官建闸,下及木石桩埽,综理纤悉,并以束河冲刷、坚固堤防为治河方针,反对分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患,颇获时人称颂。然其失在于虽晓得“必先求河

水自然之性”,却未能抓着自然性最重要的一点,虽晓得“治河无一劳永逸之道,惟有补偏救弊之策”,却一成不变,未能做到随时补偏,没有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这是其认识不真所致。^{[2]514-539}

可见,黄河之治,除了政治安定、国家重视、治理之权统一等因素外,还取决于人的智识。尽力地去治总比放任自流好许多,然在治理中,人的智识,即其认识水平和治理技术的差异,导致了治理成效的高低。其实,黄河治理的根本在于维护中上游和河谷地区的水土之稳定,减少入河的泥沙,^①再加上下游地区的分流、固堤,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下游泥沙淤积、河水狂泛的问题。因此,岑仲勉先生对民国初期至抗战时期国内所提出的几种治河主张,其中最赞同保持土壤的策略,认为这是“最根本的治黄方法”。谭其骧先生也认为:东汉王景治河后,黄河出现了一长期的相对安流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此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以畜牧为主,较好地保持了这一地区的水土。而此后黄河泛滥为害,亦主要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畜牧转向农耕。因此,今后治理黄河的根本在于改进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其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的方向发展,以促进这一地区土壤的保持。^[28]但是,此种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被人们意识到,并在实际中认真执行。^②然我们也不能据此否认古人治河的成绩,更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前人,毕竟他们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智识做了最大的努力和尝试。

①河害的根源在泥沙。黄河平均年径流量 460 多亿 m^3 , (据《黄河水帐已基本算清》一文,黄河平均年径流量 580 亿 m^3 ,载《治黄科技信息》2000 年第 3 期)年平均输沙量高达 16 亿 t,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为 35 kg,每年平均有 4 亿 t 泥沙淤在下游河道里,迫使下游河床不断提高。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山西、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流域面积 13 万 km^2 , 占全流域面积的 17.5%, 水量占 15%, 来沙量却占全河的 56%。(见张岳、周文浩《黄河治理的难点在泥沙》一文,载《中国水利》1987 年第 1 期)

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治理水土流失问题。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下,到 1957 年底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甘肃省初步完成控制面积 3.4 万 km^2 ,陕西省初步控制水土面积 1.951 万 km^2 ,山西省 1956 年就完成初步控制面积 1.14 万 km^2 。(见水电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研究组《黄河的治理与开发》,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并且,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广泛开展包括修建干支流水库、打淤地坝、修梯田、植树种草在内的水利、水土保持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至 1984 年,河口镇以上地区初步治理面积已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0%,河口镇至龙门及渭河、北洛河、汾河流域占 30%。1960 年至 1980 年,黄河中上游水利、水保工程年平均拦沙高达 5.2 亿 t,其中支流水库占 27.1%,淤地坝占 54%,梯田占 6.7%。1971 年至 1983 年,年平均拦沙 3.25 亿 t。(见张岳、周文浩《黄河治理的难点在泥沙》一文,载《中国水利》1987 年第 1 期)

三、结 语

综上所述,黄河可以为害,也可以为利,由其评价的角度不同而有灾难河和母亲河的称谓。其实,黄河本身并不具有利河或是害河的区分,其为利为害取决于运用黄河的人的智识。当人们的智识足以驾驭黄河时,黄河便安流数百年,造福于两岸的人们;反之,则泛滥无拘,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对于黄河的评价,应将其与各时代人们对黄河的认识与运用措施结合起来,具体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济南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全面指导黄河流域的治理工作,一改黄河分区治理为全流域统一治理和开发。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治理黄河再也无法简单地用堵和疏加以解决,因为它已成为一个将自然环境、技术科学和经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治河的根本在于保持中上游的水土,减少泥沙的排入。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治河者将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和下游的分流与固堤、调沙相结合,双轨齐下,终于稳定了黄河,五十年未见河患。这一措施,即谭其骧教授实现黄河中上游地区“山区园林化,沟壑川台化,坡地梯田化和耕地水利化”的治河具体措施,也即史念海教授在《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一文中提出的“解决先决条件(确保黄河下游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发生决溢事故),然后保持水土(阻碍中游的泥沙入河和治水排沙工作),最后采用疏导方法,对下游地区进行排沙”的治河方略。

新时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治河理念得到新的发展,人们提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理论框架,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是黄河治理的终极目标,而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是体现其终极目标的四个主要标志。可以说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工程,广泛涉及水利、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①除此之外,人们还积极探索科学技术在治河中的应用,这是人们对运用黄河的智识提升的结果。近年来,许多高校

和地区纷纷建立黄河研究中心并为黄河的治理献计献策,如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山东省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黄河研究中心等。这些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主要包括黄河防洪减灾及河道整治、黄河非恒定泥沙输移机理及模拟方法、黄河水利资源的利用与生态建设、黄土高原区土壤侵蚀规律及水土保持、黄河的水污染治理、黄河治理方略及数字黄河等,并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发行研究刊物等形式向政府决策贡献力量,为黄河治理集思广益。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完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等基本主张。单生态文明建设一项,就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并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这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其对于治理黄河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在,黄河有时也出现了断流的情况,使人不能看到“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1]381}的雄伟气势,但在新时期人们治理黄河理念的指导下,在人们的全面治理与安全利用下,黄河造福于社会的功用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 [1]李白.公无渡河[M]//李白.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岑仲勉.黄河变迁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3]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 [4]钮仲勋.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影响[J].地理研究.1986(1):58-62.
- [5]张海防.1855年黄河改道与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6):55-61.

^①这个理论框架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在《全国水利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提出的,见李国英《黄河治理实践中的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在全国水利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治黄科技信息》2004年第6期。

- [6] 赵淑贞,任世芳,任伯平. 试论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 534 年间黄河下游洪患[J]. 人民黄河,2001(3):43-44.
- [7] 王尚义,任世芳. 唐至北宋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人文背景分析[J]. 地理研究,2004(3):385-293.
- [8] 王尚义. 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之关系[J]. 地理学报,2003(1):73-81.
- [9] 曹志敏. 清代黄河水患加剧与通运转漕之关系探析[J]. 浙江社会科学,2008(5):93-97.
- [10] 刘洋. 唐代黄河流域的屯田与河患[J]. 中国水土保持,2003(11):37-39.
- [11] 陈广恩. 试论元代开发黄河[J]. 江苏社会科学,2004(5):232-236.
- [12] 王柠. 试论明代总河的产生[J]. 中国水利,2007(4):54-56.
- [13] 李嘎. 河患与官方应对:康雍乾时期的山东小清河治理及启示[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3):56-66.
- [14] 李靖莉. 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的河患与移民[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4):72-89.
- [15] 马雪芹. 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J]. 江海学刊,2001(5):129-133.
- [16] 张小云. 清代以来黄河改道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变迁:以黄河利津段为例[J].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13(4):76-79.
- [17] 邹逸麟. 椿庐史地论稿[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 [18] 孟尔军. 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江苏海岸线变迁的影响[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4):147-159.
- [19] 李月红. 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4):161-169.
- [20] 钱穆. 古史地理论丛[M]. 北京:三联书店,2005.
- [21] 杜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2]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
- [23]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4] 赵翼. 廿二史劄记[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314-315.
- [25]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2465.
- [26] 脱脱.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4291.
- [27]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5871.
- [28] 谭其骧.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J]. 学术月刊,1962(2):23-35.

(上接第 51 页)

- [16] 李汉林. 百苗图校释[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 [17] 张应强,王宗勋. 清水江文书:第 1 辑[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8] 张应强,王宗勋. 清水江文书:第 2 辑[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19] 陈金全,杜万华.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
- [20] 马国君. 平苗纪略研究[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17.
- [21]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0268.
- [22] 魏源. 圣武记: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84:293.
- [23] 锦屏县志编纂委员会. 锦屏县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523-524.
- [24] 罗洪洋. 清代地方政府对黔东南苗区人工林业的规范[J]. 民族研究,2006(1):77-86.
- [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241-242.
- [26] 任可澄,杨恩元. 贵州通志·前事志:第 3 册[M]. 刘显世,谷正伦,修.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444-445.
- [27] 锦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锦屏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锦屏碑文选辑[M]. 姚炽昌,选辑点校. 贵阳:贵州省锦屏县印刷厂,1977:58.
- [28] 樊宝敏,李智勇. 中国森林生态史引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52.
- [29]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林业志[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58.